

杜甫的秦陇行迹与丝绸之路题材诗歌创作

——兼论文学地理学在古代丝绸之路诗歌研究中的价值

吴昌林, 李琦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杜甫一生与丝绸之路关系极为密切,他曾长期生活于丝路沿线的长安地区与秦州地区,并深受当地地理环境影响。在长安,杜甫描写了大量以胡马为主体的丝路地域意象,并由送别诗展开了对丝路空间的虚拟建构。在秦州,杜甫对丝绸之路的文学景观进行了全面且具体的描写,并在本籍文化与客籍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丝绸之路边塞诗的独特诗风。通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丝绸之路的文学景观和诗人行迹进行研究,更可以以此为基础对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空间还原,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丝绸之路诗歌;杜甫;文学地理学;长安;秦州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2-0051-07

作为半生客居我国西北地区的诗歌巨匠,杜甫生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所长期生活的城市如长安、秦州等地均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这些城市中频繁出现的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学景观、地域性意象等都成为了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杜甫自长安出发,越陇山、达秦州的这条道路也与丝绸之路秦陇段高度重合,可以说杜甫的秦陇行迹本身就是对丝绸之路的亲历,而这些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所具有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悟也均会对杜甫丝绸之路题材诗歌的创作产生显著影响。

一、长安:丝路起点的意象描写与空间想象

天宝六年(747),杜甫前往长安参加科举,但却未能中第,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困守长安时期。这一时期内,丝绸之路对杜甫而言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对象。一方面,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位于当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和安西、北庭都护府境内,而这些地区对于此前长时间生活、游历于中原地区的杜甫而言无疑属于遥远的边塞之地,因此是陌生的;另一方面,杜甫困守时期的长安,是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性都会,杜甫生活中处处可见丝绸之路传来的新奇事物,他的很多好友也从长安出发前往丝路沿线幕府任职,这又使杜甫与丝绸之路关系颇为紧密,自然也会促使他对丝路相关事物的吟咏。

(一)咏马为主的丝绸之路意象描写

唐代长安城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国际化大城市。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汉学家爱德华·谢弗这样评论唐朝的国际化程度:“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1]18}如此多的外国人涌入唐朝,必然会使其首都长安充满异国风情,正如向达先生所言:“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羈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人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2]42}

丝绸之路对长安的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在长安城中频繁出现的异域事物上,而这些异域事物通过诗人的创作被赋予了一定的主观感情,就

收稿日期:2019-08-07

基金项目:2019年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创新研究工程项目“文学生态学视野下唐代丝绸之路诗歌研究”(19QM56)

作者简介:吴昌林(1964—),男,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琦(1995—),男,山西太原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意象。与一般意象不同,丝绸之路的相关意象由于产生于特定的丝路沿线地区,因此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也导致了当这些意象出现在长安时,不仅不会被削弱其地域色彩,反而会由于距离遥远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与内地同类事物的对照中显示出更加强烈的地域特征。如杜甫诗中频繁出现的“马”意象便是典型。杜甫对马这一意象的描写是贯穿其创作生涯始终的,但困居长安时的杜甫在咏马方面与其他时期有着明显不同,其所咏之马绝大多数是经由丝路传入中原的西域骏马,如《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

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3]167}

此诗在开头就介绍了这匹骏马所具有的强烈地域性:“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安西都护府是唐王朝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地区的安全所设立的军事机构。安西都护府设立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灭高昌之后,唐灭高昌的直接原因就在于“高昌王麴文泰时遏绝西域商贾”^{[4]2510},即高昌阻断了丝绸之路贸易。诗中频繁出现与丝路相关的地名意象:“飘飘远流沙至”“交河几蹴曾冰裂”,“交河”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市,《元和郡县图志》载:“贞观四年,于汉车师前王地置交河郡,取界内交河为名”^{[5]1032},是丝绸之路西域段的重要城市,而“流沙”根据《水经注》记载:“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6]334},也就是位于今日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同样是唐时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可见此马与丝绸之路的紧密联系。除了《高都护骢马行》外,困居长安时期的杜甫还创作了包括《沙苑行》和《骢马行》在内的一系列咏马诗,其所咏之马均为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西域和中亚骏马。即使是一些并非专门咏马的诗歌中,但凡出现“马”这一意象,绝大多数也均为西域马,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的“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和《赠田九判官》中的“宛马总肥春苜蓿,将军只数汉嫖姚”等均如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沙苑行》,此诗按王重九考证约作于开元年间,沙苑在同州冯翊县附近,为唐代政府马监:“沙苑,一名沙阜,在县南十二里……今以其处宜六畜,置沙苑监。”^{[5]37} 此诗描述了丝绸之路对唐朝马政的巨大价值:“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苑中馱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3]167} 关于“渥洼”的位置,敦煌出土的地理文书对其有详细记载:“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池水也。长得天马之所。”^{[2]432} 此处的“县”即为唐时瓜州下辖寿昌县,今属甘肃省敦煌市。敦煌为汉代以来沟通河西走廊与西域交通的枢纽城市,因此《沙苑行》中描述的胡马同样也是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西域马。而这些马不仅数量高达“三千匹”,更因唐朝政府的悉心照顾达到“食之豪健西域无”的程度,在力量上甚至超过了西域同类。

除了丝路骏马外,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奇花也是困居长安时期杜甫诗歌中常出现的地域意象。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三)中,杜甫就描写了外域奇花在长安城的生长情况: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开绝域,滋蔓匝清池。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坼渐离披。^{[3]6779}

关于“戎王子”为何,胡夏客认为是“外国王子入居内地,携有其土异花,何将军得其种也”^{[7]149}。“月支”“汉使”等意象则表明此花必然来自丝路。“月支”也就是月氏,月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极为密切,汉代月氏迫于匈奴压力西迁,在今天中亚和巴基斯坦地区建立了贵霜帝国,中国内地曾多次发现贵霜帝国的钱币,说明两地丝路贸易的繁荣。而“汉使”则指张骞,其凿空西域之举是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由此可见,杜甫在何将军山林中见到的异花正是由丝绸之路传入长安的中亚花卉。

(二) 丝绸之路空间的想象与建构

丝绸之路带给唐朝和杜甫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胡马异花等表面物质。实际上,唐代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在物质文化两方面均得以空前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丝绸之路与唐代人事制度的紧密结合。唐代大量士人为求功名进入边塞幕府任职,而唐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的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和陇右、河西两节度使就是盛唐文人经常入幕的地点。杜甫虽然没有如高适、岑参一

般亲身入幕,但其亲友却多有投身丝路沿线幕府者,因此,杜甫在困守长安时期创作了大量送人入幕的诗歌。但凡送别之作,大都会对目的地的景色有所描写,这也促使了杜甫会在诗中对丝绸之路进行空间建构,而此时的杜甫尚未亲身踏上丝路,因此这一建构是以想象为主的虚拟建构。这种虚拟建构的凭据往往是魏晋南北朝边塞诗歌中对丝绸之路的传统标签,如行政地名:凉州(武威)、交河、大宛;自然地名:青海、崆峒;自然景观:雪山、瀚海、流沙等。而这种完全凭借旧有地理知识所作的想象有时会造成杜甫对丝绸之路的空间认识存在偏差。试看《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一诗:

云幕随开府,春城赴上都。马头金
匝匝,驼背锦模糊。咫尺雪山路,归飞青海隅。上公犹宠锡,突将且前驱。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因君问消息,好在阮元瑜。^{[8]622}

根据诗题可知,蔡希曾所去之处为陇右,玄宗朝陇右节度使所辖范围包括“鄯、廓、洮、河、兰、渭诸州之境”^{[9]234}也就是丝绸之路的甘肃东段、南段和青海段,故而诗中出现了“马头金匝匝,驼背锦模糊。咫尺雪山路,归飞青海隅”等场景,但之后诗人又用“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来形容蔡都尉的辛苦,而“汉使黄河”为用典,取自张骞寻河源旧事:“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0]3160}“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10]3173}于寘即于阗,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可见此为丝绸之路新疆段;凉州即为今日武威,乃唐时河西节度使治所,为丝绸之路甘肃西段,两地均与陇右相差甚远,可见此诗中营造出的丝路空间与现实相比存在较大偏差。

二、秦州:丝路在场影响下的景观描写与独特诗风

乾元二年(759),杜甫越过陇山抵达秦州(今甘肃天水),由关中地区到达陇西地区。关于杜甫流寓陇西的时间,刘雁翔先生认为大约为三个月^[11],祁和晖先生则根据杜诗中“一岁四行役”一句推断为135天^[12]。这一时期,虽然杜甫离开了深受异域文化影响的长安,但却得以亲身进入丝绸之路东段体验生活,而秦州虽然不如长安繁荣,

但却更加深入丝绸之路腹地,秦州时期的杜甫,真正由丝绸之路的旁观者转变为丝绸之路的在场者。

(一)丝绸之路文学景观的全面描写

与长安时期相比,秦州时期的杜甫成为了丝绸之路的在场者。事实上,杜甫自关入陇西的行迹本就与丝绸之路秦陇道的路线基本重合:“唐时经过大震关通往西域的道路,乃是出都城长安西行,经凤翔,越陇山,经秦渭二州。”^[13]秦州地处丝路冲要,自汉代以后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就始终未曾改变:“秦州为西汉的天水郡故地,从那时起就是通西域道路上的重要都会,自后历经改朝换代,这条道路并未多有间断。”^[13]地理位置的改变促使杜甫对丝绸之路的认知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而地理环境的变化则使杜甫得以充分接触并了解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这使得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学景观大量出现在杜甫诗中,并变得更全面,也更生动具体,《秦州杂诗二十首》就是典型。在这二十首组诗中,杜甫对秦州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都有极为详细的描写。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
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14]1413}

此诗可谓对秦州地区人文环境描写最为全面之作,诗歌开头便介绍了秦州与丝绸之路的紧密联系。“驿道出流沙”一句明确指出丝绸之路经秦州可直抵西域,关于这一点,刘雁翔在其论文中已有明确论述:“总之,‘驿道出流沙’和‘万里流沙道’是同一条道——过秦州,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大道。”^[11]也就是上文中提及的丝绸之路秦陇道。而“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表明当时秦州地区不仅人口众多,少数民族的规模也非常庞大;“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则反映了秦州地区的民族风情,“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更进一步表明受少数民族尚武风气的影响,秦州地区的汉族青年性格也变得刚健豪放,真实地展现了丝路沿线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谐共处的情况。

除了秦州地区的人文环境外,其他与丝路相关的文学景观在杜甫秦州时期的诗作中也被反复吟咏。如陇山:“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照秦通警急,过陇自艰难”(《夕烽》);使者:“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

(其六)，“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其十)，“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东楼》)；驿道：“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其一)，“风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其十九)，“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东楼》)；驿站：“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其九)；戍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其六)；马匹：“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其五)，“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其八)。

可以看到，秦州时期杜甫丝路题材诗歌在文学景观方面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全面性，诗人不仅延续了长安时期对马的频繁描写，还加入了许多全新的丝路文学景观，从山峰到驿站，从使者到戍卒几乎无所不包，相较长安时期更加全面；二是具体性，即与长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杜甫所吟咏的丝路文学景观更加微观，但却更为具体，空间感和在场感也变得更强烈。如《东楼》一诗：

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楼角临风迥，城阴带水昏。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14]1439}

此诗在题目中就明确将诗歌的空间范围限定在秦州城东楼上，而“北门”“楼角”“城阴”等词则进一步将这一“东楼空间”加以限制。如此一来，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空间中，作者看到绵延至西域的驿道以及在驿道上往来的使节就变得极有现场感和画面感，而与长安时期经常出现的“凉州”“雪山”“青海”等想象中的文学景观相比，此诗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虽然更加微观，但却明显要具体得多，给人的空间感也变得更强烈。结合对秦州(今天水)的实地考察甚至可以发现，秦州城作为一座沿着河流而建的狭长城市，杜甫所在的“东楼”必然可以看到贯穿整个秦州城东西的驿道(即丝绸之路)，因此这些文学景观不仅是具体的，甚至可以经得起实地考察。总之，正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对《秦州杂诗二十首》的评价：“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是在宜。”^{[15]854}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秦州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当属首要。一方面，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中，曾大兴先生将能够产生繁荣的文学成果的地区归结为四类：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而秦州则恰恰满足“开放之域”这一条件。所谓“开放之域”，曾先生将其定义为：“开放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地理上的开放，二是文化上的开放。地理上的开放，说的具

体一点，即是指境内外交通的便利。”^{[16]105}毫无疑问，秦州地区正是凭借丝绸之路成为“开放之域”的，这就势必导致身处秦州的杜甫会频繁地对丝绸之路加以吟咏，对丝路文学景观加以描述。另一方面，秦州与长安相比，其政治重要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要低很多，但秦州位于陇山以西，自古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丝绸之路又不仅仅是一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跨越了千年的历史古道，是抽象历史的具象表现。如此一来，与并不突出的政治经济环境相比，具有强烈地域特点和历史厚重感的秦州人文环境与丝绸之路文学景观自然能更加吸引杜甫的创作目光，也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热情。

(二)本籍文化与丝路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诗风

杜甫在秦州地区所作诗歌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其整体诗风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诗人的丝路边塞诗歌的对比上。有唐一代曾亲身步入丝绸之路边塞地区的诗人数量非常多，尤其是杜甫所处的盛唐时期，在河西陇右和安西北庭尚未陷蕃的情况下，很多诗人曾因人幕、出使、送亲等原因行经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并留有大量反映这些边塞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诗歌。而与这些诗人相比，杜甫的丝绸之路边塞诗展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受我国西北自然环境的影响，自汉代以来的丝路边塞诗歌均以苦寒为其共同的主要特点，诗人往往通过描写边塞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劣来反映边塞生活的艰辛，并以此抒发苦闷之情。杜甫所处时期的秦州，同样为对抗吐蕃攻击的前线边塞。而根据祁和暉考证，杜甫于乾元二年七月中旬抵达秦州，直至十二月才出发入蜀，也同样要面临我国西北地区的寒冬^[12]。但杜甫所写的秦州诗中，却很少出现对苦寒色彩的刻画，对自己内心苦闷的抒发也远没有一般边塞诗人那样强烈。试比较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与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

蹄皆血流……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这两首诗的写作背景非常相似，岑参与杜甫作此诗时，均为第一次越过陇山来到陌生的边塞。不同的是，岑参所处时期为盛唐，唐朝国力正值蒸蒸日上之时，对外战争也常以胜利告终；杜甫所处时期则已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地处处烽火，吐蕃也在边境对唐朝虎视眈眈。此外，岑参越陇山的原因是出塞建功立业，是主动追求功名；而杜甫越陇山的原因则是“关辅大饥，生事艰难”^{[7]572}，是被迫躲避饥荒。然而，岑诗中体现出的苦寒之色和悲苦之音都要多于杜诗，如同为登陇山，岑参的态度是“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杜甫则为“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两人均有“愁”，但杜甫之“愁”却是因“度陇而怯，山之长也；及关而愁，地之阔也”^{[7]572}所发，明显整体意境较岑诗更为开阔，愁苦之感要减轻许多。岑诗中“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杜诗中均未曾出现，相反，“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一句反而为诗歌增添了几分空旷、寂寥的意境。

由此可见，秦州时期杜甫所作丝绸之路诗作与其他诗人的同类诗作相比，不同就在于杜甫常常使用宏大寥远的意境来冲淡边塞诗中常见的苦寒哀怨之感，这直接导致了杜甫的秦州诗中虽然也常抒发胸中苦闷，但这一苦闷以“悲”为主，“怨”则次之，这种悲苦之感是以天下苍生、黎民社稷为着眼点的，而非传统边塞诗中的个人得失，这种高远的立意和广阔的胸怀进一步消解了诗中的哀怨与凄苦。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怅望，衰飒正摧颜。

此诗前半部分描写了秦州地区的边塞景色，“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一句突出了秦州城在万重山峦之间的渺小孤独。而“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一句描绘了陇西高原夜色的空旷，体现了边塞风景的开阔寥远。至此，诗歌只给人孤独寂寥之感，毫无苦寒哀愁之色。而到了“烟尘一怅望，衰飒正摧颜”一句中，诗歌的悲凉色彩终于显露，但导致这种悲凉的原因却是“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是对国家边境安全的担忧，而非对故乡的思念或个人前途的忧虑。这样，全

诗以开阔的意境起始，又以宏大的胸怀作结，整体给人以悲凉之色，而绝无凄苦之感。

这种独特诗风，是在杜甫本人的本籍文化与秦州的丝路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关于本籍文化，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有详述，所举例证之一正是杜甫的“家庭从西晋以来就是一个奉儒守官之家，他所生长的巩县、洛阳一带，更是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浓重气息……他的精神世界一直都被儒家文化所牢笼。他的诗歌所体现的那种忠君爱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和严谨求实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本籍文化的沾溉”^{[16]133}。秦州这样一种独特的丝路环境正好为杜甫厚重的儒家本籍文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宣泄口，在这种情况下，以儒家忠君爱民的精神为基调，以边塞环境为载体的杜甫秦州诗便也拥有了与传统边塞诗所不同的诗风。

三、文学地理学在古代丝绸之路诗歌研究中的价值

近年来，学界关于“丝绸之路文学”这一话题的讨论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以古代丝绸之路文学为主要议题之一的学术会议至少召开过11次，其中有10次集中于2010年之后^[17]；在其他会议上涉及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论述更是数不胜数。此外，关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如石云涛申请获批的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诗见证的丝绸之路变迁”；邱江宁申请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18]。这表明随着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古代丝绸之路文学这一命题也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然而，当今关于古代丝路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研究方法的缺失。目前，学界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仍然大都以传统的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了对古代丝路文学研究的“新题旧作”，与传统古代边塞文学、西域文学、河西文学等相近文学类型过于同质，很难得出属于古代丝路文学的独特观点和价值，因此，运用一种适合古代丝路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就势在必行。笔者认为，文学地理学正是进行此研究最合适的方法之一，现仅以古代丝绸之路诗歌为例加以简单论述，受学力所限，难免有挂一漏

万之处,惟愿抛砖引玉,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 丝绸之路文学景观

文学地理学运用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研究,最为契合的部分即为对丝路文学景观进行研究。关于这一点,曾大兴先生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第四届年会上有详细论述。曾先生不仅提出了“丝绸之路景观带”这一概念,更明确指出丝绸之路文学景观的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的开发,为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16]409},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事实上,中国古代诗歌中对丝绸之路最为直观和清晰的反映,正是由中原至中亚的一系列文学景观串联所形成的。仅以地名为例,自长安至西域的文学景观就包括“长安”“凤翔”“渭水”“陇山”“秦州”“萧关”“陇右”“凉州”“酒泉”“敦煌”“玉门关”“安西”等至少几十个,而这些文学景观均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自然也要依赖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关于这一点,曾大兴先生和其他学者已着力在前,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二) 丝绸之路诗人行迹

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动态”和“交通”是其重要属性,而丝绸之路国内段至少包括关中、陇右、河西和西域四大地区,踏上丝绸之路的诗人们很少会驻守在某一城市,甚至某一区域内,而是会在不同的区域间往来。然而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诗人和诗歌都往往被固定在某一具体的空间内,完全没有动态的行迹变化过程。比如就岑参丝绸之路诗歌的研究来看,很多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了“岑参兄弟皆好奇”这一特点,将岑参在丝路沿线不同地区的诗统统以“好奇”为特点加以概括,认为岑参丝路诗的态度都是高昂乐观的,忽视了随着行迹的变化,岑参的诗歌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客观事实。如陇山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分界,不仅是富庶和平的关中地区和常有战火的陇右地区的分界,也是汉族为主体地区和多民族共同聚居地区的分界。岑参现存诗歌中在陇山所作的明确可考有三首,除上文提到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外,还有《经陇头分水》和《赴北庭度陇思家》。在这三首诗中,岑参所表现出的感情是对未知道路的恐惧与强烈的思乡之情,如《经陇头分水》:“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随着岑参在丝绸之路上越来越深入,其因未知环境所造成的恐惧也逐步消退,到了位于丝绸之路中

段的甘州(今张掖)时,情绪明显平静很多:“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过燕支寄杜位》)可见,尽管此时岑参仍有对故乡和友人的怀念,但却已远不如初过陇山时那般强烈。但即便此时,岑诗中仍未明显体现出“好奇”的特点,也未有乐观昂扬之情。随着岑参的丝路之行抵达敦煌,诗风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在《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岑参对敦煌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感,“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但即便此时,岑参诗中的“奇”仍不明显。

事实上,岑参丝绸之路诗歌中真正集中出现“奇”这一色彩,是在岑参穿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后。在此之前,尽管岑诗中也会有“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等好奇之语,但这些诗要么数量较少,要么是从西域归来并吟咏西域之事。当岑参沿丝绸之路步入西域时,其诗的“奇”这一特点也到达了顶峰。这里以莫贺延碛为例。莫贺延碛是一片位于沙洲(今甘肃敦煌)与伊州(今新疆哈密)之间的巨大戈壁,也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此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更无值得吟咏的人文古迹,但岑参却在此地附近创作了大量诗歌,且均有“奇”之色彩。如“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日没贺延碛作》);“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银山碛西馆》)。当顺利穿过莫贺延碛后,岑参终于得以饱览丝绸之路西域段的奇异风光,诗歌的奇异色彩也愈发强烈:“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由此可见,岑参的丝绸之路诗歌随着他本人的丝路行迹变化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前后几乎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点。要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就离不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就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岑参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自然环境与中原的差异越来越大,原先从未接触到的雪山、草原、沙漠开始大量出现,这自然会导致本就好奇的岑参将这些奇异瑰丽的景色记录在诗中。

就人文地理环境来看,陇山以东为富饶文明的关中平原,陇山以西则为相对荒凉的陇西高原,更西处则为唐与吐蕃、回纥和其他少数民族反复争夺交战的河西走廊和广阔西域,在这种情况下,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岑参在翻越陇山时自然会心生哀怨,对未知环境的恐惧和对故乡的眷恋充满内心,自然不会有心思注意身边的风景有何不同;然而盛唐时期的陇右河西其实非常富庶,《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9]⁶⁹因此,当岑参慢慢发现自己所行的丝绸之路原来是一条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繁盛之路时,心情必然会有所改变,诗歌中的苦闷之情逐渐褪去,诗人的目光也开始逐步投射到奇异的自然环境中,诗歌也走向“好奇”,走向乐观昂扬。由此可见,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野,将丝路诗人的行迹看作一种动态的迁移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这一行迹中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本籍、客籍文化影响,对古代丝绸之路诗歌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三) 丝绸之路空间还原

文学地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空间的重视,这一空间是具体的、可把握的空间,而这一特点对古代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地理名著,除了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专门的地理书籍外,诸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也大都专门设志记录某些朝代的地理状况,其中均有对丝绸之路的记载。然而与传统地理学相比,文学地理学更侧重文学研究而非地理研究,这一点在对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空间还原时有着重要价值。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古代地理书籍往往会把丝绸之路的线路情况详细记录,但这一记录却仅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做到路线还原,很难做到具体地点的空间还原,但文学作品则不然。文学作品相较地理、历史作品,其对空间环境的描写更为生动细腻。如上文提到的杜甫秦州诗歌,就不仅还原了丝绸之路在秦州地区的线路,更将这条线路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都描述了出来,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实地考察和史籍记载,对唐代丝绸之路秦州段进行空间还原就变得更为可行。

总之,古代丝绸之路诗歌作为一种地理性极强的诗歌类别,其本身就与文学地理学有着高度的契合之处。运用文学地理学对古代丝绸之路诗歌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探求地理因素对丝路诗歌产生的影响,也有利于发现古代丝路诗歌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 [1] 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吴玉贵,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2]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3] 萧涤非. 杜甫全集校注: 第一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4]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酈道元. 水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7] 仇兆整.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8] 萧涤非. 杜甫全集校注: 第二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9]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0] 司马迁. 史记: 第十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1] 刘雁翔, 王小凤. 杜甫秦州诗题咏的丝绸之路说解[J]. 敦煌学辑刊, 2010(4).
 - [12] 祁和晖. 杜甫秦州诗记写西域丝绸之路首段栈程山川人文风貌[J]. 杜甫研究学刊, 2014(4).
 - [13] 史念海. 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5(1).
 - [14] 萧涤非. 杜甫全集校注: 第三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15] 刘克庄. 后村诗话[M]// 华文轩.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6] 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7] 程金城, 乔雪. 丝绸之路文学话语与文学人类学[J]. 百色学院学报, 2019(2).
 - [18] 张清俐. 丝绸之路文学景观成学术聚焦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3-20.
 - [19]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下转第 91 页)

